

民国时期的上海文庙改制

张国鹏

提 要 出于对文庙存在模式与社会功用的反思,上海文庙洒扫局在国民革命前夕就提出了改建公园以开放文庙的设想,其中隐含着将儒家文化传布民间的意念。国民党政权接掌上海后,在新生的国民政府志在推进社会教育与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民间各方与市政当局共同筹划,终将上海文庙改建为民众教育馆并使之公园化。其实施过程中渗透着革命青年与文化耆旧的观念冲突,也交织着教育局与工务局的理念博弈。伴随着社会革新的期待与国难深重的刺激,文庙改制最终走向了培养公民品格与传扬国家意志,在固有场域下承载起了全新的社会内容,亦由此重塑了民众的期许与认同。

关键词 上海文庙 国民党 文庙公园 民众教育馆

DOI:10.15990/j.cnki.cn11-3306/g2.2020.02.004

The Transformation of Shanghai Confucian Templ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Guopeng

Abstract: Considering spreading Confucian culture to the common people, the Shanghai Confucian Temple's administration office put forward a plan to transform the Confucian temple to an open park on the eve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moting social educ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Shanghai Confucian Temple was eventually converted to a public education museum with the efforts of the new Kuomintang government and the common peop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hanghai Confucian Templ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conflict not only between the youth and the elderly but also the Municipal Bureau of Education and the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social innovation and the stimulation of national cris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emple finally moved towards the cultivation of citizens' character and the spread of national will, bearing a new social content in the inherent field, and thus reshaping the expectations and recognition of the people.

Key words: the Shanghai Confucian Temple; Kuomintang of China; the park of Confucian Temple; public education museum

文庙作为儒家文化的表征,通过官绅主导下的春秋祭祀,在帝制时代体现着“治统”

与“道统”的融合。^①辛亥革命在政治体制与社会理念上冲击了儒家文化的尊荣地位,之后的历次社会革新中,文庙往往因自身的历史形象与文化内涵而成为新文化与旧传统的交锋之地。^②文庙应以怎样的方式融入民国以降的社会,其实是对民国政治与文化再建构的认识。上海文庙在国民革命前后的改制之议与政治实践,正展现出时代变局下政权理念、社会信仰与民众情感之间的复杂纠葛。学界关于文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察文庙在帝制时代的历史发展、建筑装饰、祀典礼仪、从祀制度、庙学体例等方面,而较少关注文庙在共和之后的空间重塑与价值承载。本文通过上海文庙在南京国民政府接管上海后的改制实践,尝试对此予以探讨。

一 革命理念下文庙改制思潮的兴起

打倒军阀,践行党义,国民革命为上海带来了社会革新的气象,燃起了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与期待。^③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大学院即训令废止春秋祀孔大典。令文中解释道,孔子人格学问,自为后世所推崇,“惟因尊王忠君一点,历代专制帝王,资为师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笼士子,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④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上海少年宣讲团发起人汪龙超在1928年9月18日致函上海市市长张定璠,^⑤阐发其长久以来对社会教育的期许:“人生在学校之时短,交社会之期长。故以为学校教育虽属重要,而社会教育更为要务,在吾国学校教育尚未普及、民智未开之际,社会教育尤有促进之能力。上海为全国文明首善之区,学校教育可称发达,而社会教育向乏人提创……盖昔日军阀时代,不但无奖励私人之热心以办社教者,且唯恐加以摧残。今非昔比,已拨云雾而见青天,社会之发展可期。”进而提出建造公共公园以推行社会教育,“上

^① 对于文庙在帝制时代所汇聚“治统”与“道统”的关系,可参见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中第二部分“皇帝、儒生与孔庙”,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7—356页。

^② 从辛亥革命对文庙“扫穴犁庭,唯恐不尽”,到新文化运动欲“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再到北伐革命中改孔庙为中山祠,革命者激进的行为都是出于相同的认知逻辑。参见《常子襄先生与本社商榷进行》,《宗圣会志》第1卷第2号;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何止清《蒋总司令故乡近事记》,《申报》1927年8月1日,第16版。

^③ 大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事业的改革渲染了氛围,提供了契机。1928年9月,有人在谈到寺院的开放性与平民性后,即表示“孔庙却又是特别的一种东西,那里有一种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他的大门也始终闭上的,他对于平民不生什么关系。废除孔庙有许多地方已经实行了……倘使要有孔子的庙,照从前那样闭关自守,独保他的尊严是不行的,非得下来和我们平民握手不可。倘使孔子一定愿意做帝王之师,那么要把他的庙当做公园看待是不行的,而孔子之徒也一定不答,孔子的子孙也以为渎圣,那么我们断然不要这种如同虚饰的孔庙。一切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的,我们接受,否则我们毁灭他!”参见岂凡《寺院与孔庙》,《一般》第6卷第1期,1928年9月。

^④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 民国十七年(1928)一至六月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8年,第279页。

^⑤ 上海少年宣讲团成立于1912年1月1日,由汪龙超等人发起,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口号,以改良风俗、开展社会教育为己任,力图通过宣讲活动来唤醒大众的爱国热忱,实现国家强盛,不受外侮。1917年开始组织化妆演讲部,表演音乐、幻灯、歌舞、国技,以增加宣传对象的兴趣。少年宣讲团的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和支持,1921年春,南市工巡局把团所南面的一条小路命名为“少年路”,以资纪念和褒奖少年宣讲团对社会的贡献。参见沈席华《上海少年宣讲团的光辉历程》,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都会遗踪》第3辑,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年,第25—28页。

海市建设改造之始,重要之政,社教乃一。窃念公园为社教之一种设施,查沪南人口稠密,市肆繁盛,独公园之设尚无”。但是市区已经没有余地来建造面积广大的公园,于是筹划改造文庙之计,“应就原有公共建筑而改造之,事半功倍,易于功成。查文庙地处沪南中部,占地广阔,建筑坚固,有泮水之池,魁星之阁,明伦堂可作公共演讲之用,改废物为利用,又可表孔子之圣贤。群众得以游览,不若只闭之无益。并得加以建设,如通俗演讲所、通俗教育馆、阅览书报所、改良茶馆等”。^① 上海市政府在 21 日将该呈文下发至上海市工务局,^②要求其核议具覆。接到市政府饬令后,工务局局长沈怡即亲赴文庙勘察。^③ 在 24 日给市长的呈文中,沈怡支持了汪龙超将文庙改建公园的提议“文庙地点位于西门南部,交通极为便利,内部空地亦多,以之改造公园,甚属合宜。”^④

汪龙超将文庙改建公园的提议在《民国日报》刊登后,引起了社会的积极响应。9 月 22 日市民尹勇等 11 人具呈市政府,极表赞同将文庙开辟公园之议,认为“我国民革命军政已将结束,训政即在开始,所有市政建设,急不容缓,查上海为全国荟萃之所,中外观瞻之区,故市政设施,当用先知先觉之精神,为全国之先导,故公园之设立,亦为市政之要图。沪南文庙,地处中心,建筑坚固,内有魁星阁、泮水池、明伦堂,可作演讲之所,藉此宣传三民主义,既可将党义灌输民众,又可表示尊孔,供人游览,即社会教育,亦可发展,将此废物,化为有用。且沪南民众,渴望有年,因前军阀铁蹄所压,虽提议者不乏其人,而未得效果,今既处于为民众谋幸福之青天白日旗下,可解决一切,故有公园之建议于前,同人等响应于后”。^⑤ 从汪龙超、尹勇等前后两次向市府的呈文可以看出,上海文庙开辟为公园之议,从其伊始就不仅仅只为提供一个游览休憩之所,而是承担了社会教育之期待。不同于之前开放文庙而使儒家文化传布民间的设想,此次文庙开放之议其初衷已与尊孔无关,而是转向了更广泛的社会教育,背后的意识形态也从儒学转向了三民主义。响应少年宣讲团提议的 11 人均相当年轻,除 1 人五十一岁,1 人四十一岁之外,其余 9 人均在二三十岁上下,职业遍布士农工商,1 人在农业协会,1 人在工业,4 人在商业,5 人在学界,^⑥正是这些年轻的新起之秀开启了改革传统文化、传播社会新理念的时代之音。

^① 《工务局关于文庙整理文书》(1928 年 9 月 18 日),《上海市工务局关于文庙整理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Q215-4-8090。

^② 此时该局尚称为上海特别市工务局,于 1927 年 7 月开始筹备,先后接收前上海市公所工程处及前沪北工巡捐局之工务处暨前浦东塘工善后局经办工程事项,设局于沪南前上海市公所原址,不久上海特别市政府任命沈怡为局长,该局遂于 1927 年 8 月 1 日正式成立。1930 年 7 月 1 日改称上海市工务局。成立之初,分为四科,其中第二科掌设计道路桥梁沟渠公园菜场等工程,上海文庙的改建此后都是由第二科具体设计与施行。参见上海市工务局编《上海市工务局之十年》,1937 年。

^③ 参见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5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第 455 页。

^④ 《为遵饬核议少年宣讲团请将文庙改建公园一案签呈鉴核由》(1928 年 9 月 24 日),《上海市工务局关于文庙整理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Q215-4-8090。

^⑤ 《呈为响应沪南公园建议将文庙开辟公园请求核准事》(1928 年 9 月 22 日),《上海市工务局关于文庙整理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Q215-4-8090。

^⑥ 同上。

二 政权交替后文庙改制的筹划与冲突

1928年10月2日张定藩市府训令工务局,要求其会同教育局核复尹勇等人的呈请,工务局第二科在受过良好工程学教育的科长许贯三具体负责下草拟了文庙改建公园计划。这份最初的计划书对文庙改建提出了大胆设想,展现了鲜明的革新理念,认为现在“思想尚新,尊孔之风大减,倘不将文庙另行利用,此区区公游之所,将由颓败而平地”,由此具体提出“大成殿拟定为全庙大小各殿堂内神座收容所,特留此一殿以代表曾昔尊孔之遗迹”,并将崇圣祠改作图书馆,“走廊厢房(大成殿旁)暂改作国货售品所、标本陈列所、国货陈列所,或民众茶点室”。^①1926年9月上海县议会曾议决,规划改建文庙四附祠,使其一律包入文庙宫墙之内,以尊崇固有体制。^②而两年后的今天,由于国民革命的冲击,不仅对四附祠的规划改建未能成行,连宫墙自身也将难保,“旧有围墙,厚十五寸,高十尺,共长约七十丈,均应拆去”。^③这次文庙改建设想,突出了民众场所的公共性与社会性,而儒家文化的价值几近扫荡无余。11月9日市长张定藩批准了这份文庙改建计划,所有经费即在12月份工程费内支拨,唯将所呈原计划中的图书馆改作民众教育馆,所需设备由教育局计划。^④市政府将文庙内拟设的图书馆改作民众教育馆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关,早在4月20日江苏大学区县教育局联合会上,即有兴化县教育局呈请苏大通令各县文庙一律改设通俗教育机关,以免荒废。^⑤上海市教育局亦积极筹划民众教育,将原有之平民学校十所加以整理改为民众学校,并组织民众教育研究委员会,聘请本市教育专家为委员,负责研究及计划关于民众教育之实施方法,到8月份上海市教育局已有意利用即将接管的上海县文庙以设立通俗教育馆。^⑥

在年轻而有海外经历的工程学家筹划下,市政府对文庙改建的这份批文在《市政周刊》披露后,立刻引发了上海文化界人士的忧虑,随后一份以“上海学宫洒扫局司董”蔡尔康领衔的呈文函至上海市政府。在这份呈文中,首先阐述了文庙在共和时代的文化意涵:“孔子至圣,历代尊崇。两千年来,都会郡邑,庙貌庄严。前后殿庑,圣贤儒先临上,质旁使人吊敬。其附祠之名宦、乡贤、忠义孝悌等等,皆有功德于地方,深得群众之信仰,为星

^① 《草拟文庙改造公园计划》,《上海市工务局关于文庙整理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215-4-8090。

^② 根据《大清通礼》,省府厅州县各文庙祀先师,忠义孝悌、节孝、名宦、乡贤四祠应附庙左右。附祀孔庙,礼制隆重,每于上丁释奠,同日致祭,以敦伦纪而植纲常,正人心而端风俗。1853年小刀会攻陷上海,到1855年清军收复上海,期间文庙为小刀会所占据,损毁严重,文庙因此异地重建,忠义孝悌、名宦、乡贤三祠均随文庙改迁,唯留节孝祠于文庙旧基址,形成了六十多年来上海文庙不合常规的格局。1926年9月根据两位议员的提案,上海县议会为崇体制,规划改建四祠,使其一律包入文庙宫墙之内,由县教育局会同款产处筹款后交会议并顺利通过。参见《征访局定期迎送褒扬乔木入祠》,《申报》1926年3月2日,第14版;《改建节孝祠案之呈复》,《申报》1926年10月21日,第15版。

^③ 《草拟文庙改造公园计划》,《上海市工务局关于文庙整理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215-4-8090。

^④ 《为核议尹勇等请将文庙改建公园案请拨款兴建呈悉仰从速兴工经费在工程费内支拨由》(1928年11月9日),《上海市工务局关于文庙整理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215-4-8090。

^⑤ 《江苏大学区各县教育局联合会开会情形》,《申报》1928年4月22日,第11版。

^⑥ 《市教育局八月份业务进行状况》,《申报》1928年9月27日,第22版。

拱辰,为川归海,历史久远,印象刻深。以故黉宫体制,在君主时代,固为全地方礼典之冠冕;在民主时代,仍为全地方风教文化之中心。”然后针对国民政府教育部利用文庙办理教育的命令,提出上海文庙向来与教育之旨不违。“本邑黉宫东部之土地祠,自前清同光以来借设学塾,其后推广课宝,又借用宗祖经师祠,洒扫先董祠,中间并曾于可当斋借设全邑学务公所,于明伦堂迭次借开全邑学务公会,于尊经阁迭次借开小学成绩展览会,又曾借阁前空地试办学校园,借前后庭院暂作各校公共体操场,如此之类,颇难更仆。是部令所称教育利用,吾邑早已施行历五六十年之久。”随后话锋一转,上海文庙虽向来不乏学校教育活动,但始终与尊孔无碍,“其利用祠屋,于神厨、祀位、供案、炉檠,滋未敢稍有侵犯,且塾校师生对于平时洒扫、临时礼式,皆有赞助,而无梗碍。其利用余地,也皆有整理,而无作践,故能历久翕然”。进而提出对市教育局将文庙改建民众教育馆的担忧。“前事不忘,得资考镜。为此环[还]请钧府察核饬令教育局,于利用建设之际,注意保存祠庙尊严,勿稍侵碍。”^①呈文的签署者达到30人,多为上海文化名流,如蔡尔康、姚文楠、姚文栋、叶景瀟、莫锡纶、李宗邨、林祖潘等。这份呈文中,虽然并未直接反对利用文庙开办民众教育馆,但已暗示文庙作为儒教圣域的地位不应改变,不满工务局年轻的工程师们将文庙崇圣地位扫荡无余的改建规划。这些签署人与前文响应少年宣讲团改建文庙公园的11名呈请人相反,在年龄上已属两个时代。支持文庙改建的呈请人明显年轻,大都从事小商业。担忧文庙改建的呈请人则多已过中年,为地方文化界、教育界名流,甚至部分人还在政商界具有较高社会地位。虽然他们大都从晚清走来,但教育背景并不保守,视野亦不封闭,多人常年留学海外,不乏工科背景。在国民革命军接管上海,国民党的统治稳固后,利用文庙推行社会教育的理念虽然并未出现公开的分歧,但对文庙利用的方式还是存在着本质的争议。年轻一派在革命的洗礼下变得更为激进,对传统文化缺少内在感情,在推行民众教育事业的感召下,将儒家文化拉下圣坛。而年老的长者,面对文庙的改建则显得更为冷静,仍视传统文化为共和时代不变的价值,民众教育亦当与儒家文化相结合。

此时执掌上海市教育局者,为年轻的韦恂局长,其左派思想底色,影响到教育局对文庙改建的理念,使利用文庙推行民众教育的设想更为坚决。^②面对工务局将文庙改建为公园的规划与市政府在文庙公园内设立民众教育馆的批文,教育局展现了对民众教育更富雄心的理想。在工务局要求教育局提供对文庙公园内设立民众教育馆的开办计划时,教育局在事前未与工务局会商的情况下直接上书市政府,提出将文庙全部改建为民众教育馆的要求。教育局的这一举动令工务局大感意外,工务局遂在1929年1月25日致函市长张定藩,重申工务局将文庙改建公园的计划及只将公园内原拟建之图书馆改为民众教育馆的市府批文,将教育局的擅自变更提交市长裁夺。^③此时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教育

^① 《上海学官洒扫局司董蔡尔康等为呈请事》,《上海市工务局有关市立民众教育馆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Q215-1-8251。

^② 出生于1896年的韦恂,早年参加同盟会,亲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之后留学英美。回国后,韦恂任职于教育界,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关系密切,曾在毛泽东启发和廖仲凯(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帮助下,到广东中山县做农民运动工作。1928年在蔡元培推荐下韦恂出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参见吴成平主编《上海名人辞典》,第42页。

^③ 《为文庙改建公园抑改为民众教育馆请核示遵行由》(1929年1月25日),《上海市工务局有关市立民众教育馆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Q215-1-8251。

部已有利用文庙办理教育之明令,但行事素多自主的张定藩市长仍然于2月4日否决了教育局将文庙全部组织民众教育馆的提议,维持了工务局原拟之文庙公园化议案。^①

然而工务局这份经市政府核准的文庙改建方案由于两方面的原因而搁浅,一是教育局有意将文庙全部改作民众教育馆,而迟迟不将仅在文庙公园内设立民众教育馆的规划提交;二是文庙公园的改建经费本拟从1928年12月份工程费内支拨,然而由于财政局1927年度积欠之工程经费一时无着,张定藩被迫同意将文庙改建经费暂时用来垫付财政局欠款。第一个原因导致了在文庙改建公园中教育局的行为消极,而第二个原因则直接导致了市政府批令文庙改建公园一案暂缓进行。^②

三 国民党政权主导下文庙改制的施行

市政府的决定打消了教育局将上海文庙全部改建成民众教育馆的积极性,一直到5月份教育局局长韦恂调任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时,教育局仍未制定出文庙内拟设之民众教育馆的详细计划。1929年5月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宣传部长的陈德征接任韦恂出任教育局局长。工务局随即于5月16日致函教育局,要求其按照前议尽快制定民众教育馆计划细则。^③同日在国民党上海市执委会常会上,一区党部呈请市党部将文庙改建公园议案转咨市府,^④同时工务局呈文市府再次申明文庙改建公园从市政现代化的角度已属“当务之急”,请求市府对于文庙公园的改建仍照原案办理,并饬令财政局拨还垫款、教育局从速制定民众教育馆规划。^⑤一个月后教育局在新晋局长陈德征的领导下制定出拟办民众教育馆之设备计划,该计划大致依据市政府核准之民众教育馆简则中各部组织细则以及市工务局改造文庙公园的框架制定,主体机构并无特别之处,分为图书部、演讲部、博物部、艺术部、体育部,但在这些大类之外利用文庙崇圣殿设立国耻纪念馆与革命纪念馆,^⑥则带有新局长长久以来宣扬革命与组织反日的色彩。^⑦

1929年2月市政府曾否决教育局将文庙全部改作民众教育馆的提议,当6月份教育局在新任局长带领下按照市政府的这一训令制定出文庙公园内设民众教育馆的规划时,

① 《文庙改建公园抑改为民众教育馆请核示呈悉仰查照原案办理由》(1929年2月4日),《上海市工务局有关市立民众教育馆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Q215-1-8251。

② 《为陈明文庙公园经费业已指定的款拟仍照原案办理由》(1929年5月16日),《上海市工务局关于文庙整理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Q215-1-8090。

③ 《为函请迅将拟建文庙公园内民众教育馆设备计划拟送过局俾便进行由》(1929年5月16日),《上海市工务局有关市立民众教育馆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Q215-1-8251。

④ 《市执委会第二十一常会纪》,《申报》1929年5月16日,第14版。

⑤ 《为陈明文庙公园经费业已指定的款拟仍照原案办理由》(1929年5月16日),《上海市工务局关于文庙整理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Q215-1-8090。

⑥ 《为函复筹设民众教育馆计划》(1929年6月17日),《上海市工务局有关市立民众教育馆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Q215-1-8251。

⑦ 陈德征在1926年任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时,就以宣传三民主义及国民革命最力。1927年4月开始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宣传部长身份,领导和组织上海的反日运动。其主编的《民国日报》开辟《反日特刊》,“俾便将济南惨案真相,充分传达于世界各国”。次年5月当选为“上海各界反对日军暴行委员会”主席兼宣传委员会主任。参见陈公毅《陈德征行述并赞》,《硬的评论》第1卷第6期,1930年10月25日,第88—90页;《上海反抗日军暴行委员会》,《申报》1928年5月18日,第13版。

上海政治环境已发生了悄然变换。由于孔庙财产之处理,各地颇多争执,教育、内政、财政三部特会商保管办法,于3月份由三部会衔公布施行,其中第二条提到“孔庙财产,均应拨充各地方办理教育文化事业之经费,不得移作他用”,第四条“孔庙房屋,应由各该保管孔庙之教育行政机关以时修缮,其原有之大成殿,仍应供奉孔子遗像,于孔子诞辰开会纪念”,第五条“孔庙地址应充分利用,以办理学校,或图书馆、民众学校等”^①使得利用文庙举办社会教育有了政策依据。此时张群已于4月1日接替被撤职的张定藩出任上海市长,相对于张定藩具有的独立性,张群更倾向于同南京政府保持同步。^②在张群出任市长后,一反之前市政府所批工务局文庙改建公园之规划,决定将文庙全部改为民众教育馆:“本府一百二十七次市政会议议决,将孔庙改设民众教育馆,其中古迹名胜务加保留,并使之公园化。”^③市政府的这次决议,支持了教育局之前最大限度推进社会教育的设想,同时也兼顾了工务局建设文庙公园的动议,文庙改建的基调由此正式确定下来。虽然张群市府的批令平息了工务局与教育局之间关于文庙改建方案的争议,然而财政局无力承担,“现在年度将终,市库又异常支绌,所有此項事业款,请仍尊钧府前令,暂缓进行”。^④张群市府的核议也终因财政的困境而搁置。

面对财政原因而使文庙改建陷入的困境,教育局与工务局并未就此放弃这一开拓性的构想。一年之后的1930年7月12日,教育局致函工务局提出财政支绌形势下文庙分批改建民众教育馆的权宜办法:“本市民众教育馆自筹备以来,历时已久,卒因市库支绌,经费无法筹措,遂致延未成立。现拟将该馆原定计划,分别缓急,次第进行。”由于图书馆建筑设备等费已经市政府指拨在案,因此可先于文庙内动工兴建图书馆。^⑤随后教育局采取了一系列利用文庙的措施,8月份令文庙保管员将文庙部分园地拨归公共校园整理,拟分期将此校迁移于文庙。^⑥同时教育局在文庙内明伦堂设立第一中心民众学校,分早班、半日班、夜班授课。^⑦在教育局利用文庙积极推行社会教育的筹划下,工务局于11

① 《教材内三部公布孔庙保管法》,《申报》1929年3月7日,第10版。

② 作为政学系的关键人物,张群深受蒋介石倚重。蒋氏经常把最不放心的、最难处理的事情交给张群办理。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原大战时入关援蒋,都因有张群的周旋奔波。参见杨颖奇主编《民国政治要员百人传》,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第125—127页。

③ 《上海特别市市政府训令字第1310号》(1929年8月7日),《上海市工务局有关市立民众教育馆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215-1-8251。

④ 《市政府训令6154号》,《上海市工务局关于文庙整理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215-1-8090。

⑤ 《函请绘制市立图书馆建筑图样》(1930年7月12日),《上海市工务局关于文庙图书馆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215-1-8178。建筑市立图书馆一案,曾于1929年9月间呈请市府指拨工务局1928年度事业费项下积存余款一万五千元为建筑设备等费,嗣后于1930年3月25日奉市府指令核准。参见《上海市政府训令字第6035号》(1930年10月13日),《上海市工务局关于文庙图书馆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215-1-8178。

⑥ 《文庙园地拨归公共校园》,《申报》1930年8月24日,第17版。

⑦ 1930年开始,教育局陆续在全市设立中心民众学校两个、区民众学校70个。参见《民众校补习校推广计划》,《申报》1930年9月9日,第9版。

月 15 日呈文市府请求拨发临时经费以进行文庙公园的整理。^① 此时教育局局长为熟悉市政工程的年轻工程学家徐佩璜,^② 这使得教育局在文庙改建的规划上与工务局有了更多契合点。在工务局呈文市府后, 不等其回复, 工务局局长沈怡即于 20 日会同教育局局长徐佩璜亲至文庙详为察勘, 二局决定将全部文庙大加修葺, 以保古迹, 并在四周空地上建筑图书馆、音乐厅、博物馆、动物园等, 新建房屋与文庙各观大致相同, 极形典雅, 使得市民于谒师古迹之余更得一进德游息之所。^③ 二局在文庙改建的筹划理念上达成一致, 将社会教育与公共园林融为一体。随着北伐革命激进的回落, 此时更为注重保护文庙古典建筑, 并有意通过保留文庙固有建筑以阐扬传统道德精神。

12 月 13 日工务局拟就文庙整理计划书, 并与教育局会呈市府, 该计划书的整体思路为“以保存原有古迹名胜, 暨发展民众教育为原则, 并于设备上务使之公园化。”^④ 由此制定出具体的整理文庙计划“凡古迹名胜, 俱照旧保存, 并利用余地, 增建屋舍为办理民众教育之用。庙内原有建筑物, 如门首、牌坊、桥拱、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明伦堂、魁星阁, 或以先圣关系, 或以古建筑物之美丽, 悉加保存, 并重行修葺。惟旧有大成二门及东西两庑房屋, 因无修理价值, 俱拟拆除, 使各部分联成一贯, 形势上也可顿见宏伟, 并改筑沿文庙路之墙垣, 以壮观瞻。复于庙内依照公园布置方法, 加筑步行道路, 栽植花草树木, 并将魁星阁前之池水设法澄清, 俾市民于瞻仰庙貌、阅览书报之余, 并获身心游息之所。”并利用庙内空地建筑音乐厅、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 建筑形制力求与庙内原有建筑物相得益彰之美。^⑤ 此项计划于 1931 年 1 月 22 日得到张群市政府的批准, 与 1928 年 10 月工务局最初制定的文庙改建计划相比, 新计划更加注意保存文庙的原有建筑, 并力求使新建屋舍与原有建筑相协调, 同时有意维护文庙所象征的传统道德价值。这虽然与执政者前后的人事更改息息相关, 也与整个国家的环境变化密不可分, 随着新政权的稳固, 革命的激进性回落, 国家开始注重传统文化的延续。

这份文庙整理计划, 共分两期进行, 第一期工程于 2 月 26 日开标, 主要是整理文庙的景观方面, 包括四座石桥、修葺大成门、移建两座牌坊、改建围墙及便门、建造临时花房以及拆除部分旧房屋。^⑥ 中标之三森建筑公司积极进行, 所有文庙南部之围墙, 完全拆去, 建砌砖墩, 每墩相间约距五六尺, 其中间栽植冬青树, 使园外人得以窥见园内。各座石坊, 以年久颓蚀, 而全部卸下, 将一切石柱一一抛旧出新, 重行砌造。大成殿前莲花池之大石

^① 《为筹划整理文庙估计工款请予核拨临时经费俾便兴工进行由》(1930 年 11 月 15 日), 《上海市工务局关于文庙整理文书》,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Q215-1-8090。

^② 徐佩璜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 回国后任南洋大学中学部主任、中国工程学会会长。参见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下册,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5 年, 第 1971 页。

^③ 《文庙将成本市文化中心》, 《申报》1930 年 11 月 21 日, 第 10 版。

^④ 《为遵令拟具整理文庙计划书及图案呈请签核示遵由》(1930 年 12 月 13 日), 《上海市工务局关于文庙整理文书》,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Q215-1-8090。

^⑤ 《整理文庙计划书》, 《上海市工务局关于文庙整理文书》,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Q215-1-8090。

^⑥ 《上海市工务局整理文庙第一期工程说明书》(1931 年 2 月), 《上海市工务局关于文庙整理文书》,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Q215-1-8090。

桥一座、小石桥两座、泮池侧石桥一座,一律拆去重建。^①随后4月25日文庙整理第二期工程开标,主要为修理大成殿、崇圣祠、明伦堂及竹篱等,同时浚池叠石,种植花木。第一、二两期工程均全部于10月间完工。公园内拟建之市立图书馆、音乐厅于4月23日开标,但因价格原因,音乐厅未能中标兴工,图书馆于12月建筑完工。^②

虽然在教育局与工务局的有效协作下,文庙整理工程顺利完成,但两局在文庙改造利用中理念上的差异仍然在细节处展现出张力。1932年11月民众教育馆因馆舍不敷使用,拟将大成门南向之木栅及中间横壁拆除,另于两壁堆砌墙壁,装置门窗,使成为适用之房屋,以辟作民众问字处、民众代笔处、民众诊疗室、及时事展览室之用,由教育局转请工务局施工改造。在11月23日教育局致工务局的函件中表示“查该馆馆舍狭窄,确感不敷应用,经派员实地查勘,认为大成门两旁空屋,稍加修改,尚能切合实用,并与中央规定利用文庙办理社会教育之旨,亦相符合,且大成门之名称照院令规定,应在废除之列,修葺利用,更无妨碍之处。”并表示对大成门的变更利用会根据文庙的建筑体式,力谋与环境契合,不妨观瞻。^③然工务局坚持应保存大成门原有之样式,教育局这项改造计划因工务局的反对而未能成行,文庙民教馆对此耿耿于怀“是以所谓大成门者,仍只有屋顶而无墙壁门窗之过路门埭耳……所有时事展览,遂不得不因陋就简,布置在不蔽风雨之大成门内,致使展览品难于管理,诚莫大之憾事也。”^④教育局与民教馆倾向将文庙完全改造成用来推行民众教育的场所,工务局则从文庙公园化的角度坚持文庙景观的完整。在工务局将文庙改建公园之议初起时,传统人士担忧文庙建制将由此遭到破坏,在给市政府的呈文中寄希望于教育局监管文庙的改造,^⑤教育局则自有利用文庙推行民众教育事业之雄图,文庙建制的保存最后反赖工务局牵制教育局的激进,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吊诡。

就在文庙整理工程即将完工之时,教育局开始着手筹备民众教育,拟将原有吴淞、蒲淞、法华、塘桥各区所设简易民众教育馆裁撤,利用文庙房屋设立规模较大之民众教育馆。1931年7月30日召集第一次筹备会议,随后筹备工作有序展开。10月12日筹备处迁入文庙崇圣祠办公,并将民众教育馆事业进行计划及各项章则呈教育局核办,12月14日教育局以民众教育馆之房屋、用具、计划、法规均已次第就绪,任命李大超为馆长,文庙民众教育馆正式开办。^⑥随后的元旦为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文庙民教馆悬旗志庆,虽然此时国难深重,沪战爆发在即,文庙民教馆仍特为开放两日,以示与民同乐,民众来馆参观者,

^① 《文庙改建公园》,《申报》1931年4月23日,第15版《整理文庙第一期工程合同》(1931年3月5日),《上海市工务局关于文庙整理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215-1-8090。

^② 上海市工务局《工务局业务报告二十年七月至二十一年六月》,1932年,第68页《上海市公管局整理文庙第二期工程说明书》(1931年5月),《上海市工务局关于文庙整理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215-1-8091;《呈报招标建筑市立图书馆、音乐厅开标情形》(1931年5月1日),《上海市工务局关于文庙图书馆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215-1-8178。

^③ 《上海市工务局有关市立民众教育馆文书》(1932年11月2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215-1-8251。

^④ 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编《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概况》,1933年,第65页。

^⑤ 在文庙改制之议初起时,蔡尔康等出于保全文庙,要求市政府“飭令工务局遇有文庙范围以内之工程,务依教育局之规划,勿稍越俎,以顺民意”。参见《上海学官洒扫局司董蔡尔康等为呈请事》,《上海市工务局有关民众教育馆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215-1-8251。

^⑥ 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编《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概况》,1933年,第17—18页。

竟达万人,此时民教馆各项事业尚在筹备之中,足见民众对文庙开放之热情。^①不久一·二八沪战爆发,各种事业中经停顿。至6月1日,文庙民教馆园景部分全部开放,随后一·二八战迹展览室、阅报室、儿童阅书室、祀孔彝器陈列所、健康教育展览室、民众娱乐室等相继开放,由此至1932年10月10日,教育局令文庙民教馆正式开放,宣示国民党政权主导下的文庙改造计划正式完成。^②到1932年底,文庙改造格局为:

表1 上海文庙改造前后对应表

改造前	改造后
大成门	时事展览室、儿童阅书室、娱乐室
大成殿	祀孔彝器陈列所
崇圣祠	一·二八战迹展览室、生计展览室
明伦堂	演讲厅、民众学校教室、阅报处等
藏经阁	市立图书馆
魁星阁	会客室
儒学署	公民教育展览室、东北战迹展览室、健康教育展览室

在空余地方使其园景化,布置池塘、荷花塘、假山等。

注:此表根据《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概况》(1933年)扉页之“本馆平面全图”整理。

四 文庙改制后的社会活动与民众观感

文庙被改造为民众教育馆后,其组织建构共分五组,除事务性的总务组外,主体部分为教导组、展览组、演讲组、健康组。文庙的此番改造,其志固在推进社会教育,但背后的长远设想仍不离政治目标,“欲建立健全之民主政治,必先有健全之民众,故孙中山先生于弥留时,亦谆谆以‘唤起民众为遗嘱’”。因此民众教育馆设想通过“教导民众,以增进民众知识,陶冶民众性情,引导民众参与改进社会及文化生活。总之,以培养健全国民,实现民主政治为目标”。^③然而上海文庙改造之时,国家接连遭遇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沪战,民族的危亡迫在眼前。因此宣扬国家大义、激发民族精神就成了上海文庙民教馆时代压力之下的自然选择。从1932年下半年这最初的实践看,民众教育馆所举行的活动按性质可归为塑造国家与革命精神、实施普遍社会教育与保存文庙固有规制三方面。在塑造国家与革命精神方面,主要表现为举行一·二八战迹展览、革命纪念展览、时事展览、儿童演说比赛以及撰贴爱国春联、发行《新民旬刊》、开展学术演讲等;实施社会教育方面主要表现在举办健康教育展览、公民教育展览、民众学校、巡回文库、巡回演讲、民众音乐会、娱乐室以及组织民众远足、为孩童种痘、发行《新民画册》、改良说书、开展通俗演讲等;保存

① 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编《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概况》,1933年,第18页。

② 同上,第19—23页。

③ 同上,第69页。

文庙规制方面则主要是在大成殿里开设一个祀孔彝器陈列所。^①当然这种归类只是相对而言,具体某一项内容可能兼具多方面目的,如学术演讲与通俗演讲其内容都相当广泛,只是学术演讲更侧重于激发民族精神与促进民众对国家的认知,而通俗演讲则更侧重于日常生活。这种多方面目的在改良说书中有更为鲜明的体现,说书作为一种娱乐方式,长久以来流传于都市乡村,对民众的智识与生活都有广泛影响。民众教育馆教导组认为旧式说书皆陈腐而不合时代,如《三笑描金凤》等,其内容均为“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之类,不但不合时宜,且书中暗示一夫多妻制,已与现代法律抵触,并说书者有时为迎合听众心理,以书中淫秽之处,大加描述,无微不至。举办改良说书,就是要审慎选择说书人员及书中材料,并编辑合乎时代潮流之新说书材料,以培养民众之现代生活。^②但改良说书同样被赋予了国家使命,馆长杨佩文即表示“改良说书即采取旧说部中原有之精华外,以发扬民族精神、激励爱国思想为主素,并参考各种常识及教育资料,俾使民众于娱乐之中,对于国家民族,发生热烈之情绪及深切之观念。”^③

文庙改造的完成,使“万仞宫墙”下的圣域从此为各个阶层的民众免费开放,打破了昔日官绅的垄断与圣俗的悬隔,使徜徉其中的人不无自豪感,“他日归家夸弟妹,阿兄常到圣人乡”。^④在上海这样一个租界林立、阶层悬隔的地方,文庙的开放为民众带来了华界自强的荣耀与社会平等的期待,“这里没有幽逸的情,没有华贵的绅士小姐,微接着腰轻轻的笑。这里不像顾家花园的葱茏,绿叶丛中蓝色电灯像做梦——威权者做征服殖民地的梦。这里不像虹口公园那末严重,靶子场上机关枪声隆隆,显示日帝无法无天的威风。这里不像外滩公园的爽敞,面着大江有夜风飘荡,中西雅人斯文的徜徉。这里是绝对的平等,这里是真正的公开,不用派司门票,不问年青年老”。^⑤也为平民阶层带来了日常生活的尊严,“在这里游园的朋友吗,谁也不是坐汽车来的,大家都走来的吧?充乎其量只有少数是坐着人力车来的;因此,当你走到园门,便会体验到这里自有一种平民化的意味,这园子并不是少数有闲阶级的专有物”。^⑥而家住其附近的民众,更是多享其便,“住在西门附近的人,有一个便捷的写意的去处……他们很可以把文庙公园(即上海市民众教育馆)当做自己的家园”。^⑦

雅致的园林景观与弥漫的文化气质成为改造后文庙的独特观感,为拥挤的城市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文庙园景部分开放不久,人们欣喜之情即溢于言表,赋予它深情的期许“有人说:法国‘花园是个半老底徐娘,兆丰‘花园是个妩媚底小姑娘,外滩‘花园是个热情底少妇。我们底文庙‘公园呢,是个学者。”这“学者”,不但在于它的风景,更是在于它的内涵,“在文庙公园,不仅使你感到空气的新鲜,他还会告诉你,这是什么花或什么树,属于哪一类哪一科的,并且在一·二八纪念室里,你可以见到六百磅的重量炸弹,你可

① 对于上海文庙改造为民众教育馆后所开展的详细活动与实施理念,可参见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编《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概况》,第31—201页。

② 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编《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概况》,第133—134页。

③ 《市民教馆改良说书》,《申报》1932年12月8日,第12版。

④ 《重游泮水诗四绝》,《大丰昌月刊》第12期,1934年。

⑤ 长庚《文庙公园之夜》,《妇女共鸣》第5卷第9期,1936年。

⑥ 黄影采《初冬的文庙》,《申报》1934年12月7日,第16版。

⑦ 《风土小志 西门掌旧》,《申报》1935年7月23日,第16版。

以见到忠勇健儿用铁血换来的种种战利品,你可以见到那些畏死的兽类的护身符,在这里,你会听到卫国健儿悲壮底呼号,在你耳畔重复的喊叫。其他,他会告诉你祀孔的用具和一些普通的卫生常识”。^① 社会教育就这样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了公园的娱乐中,一·二八战迹展便是恰逢其时,警醒、激荡着国难危重之下的民众,“经过了一·二八战迹前,心上又是一阵惊战……听!哪里来的惨吼声?是动物园困狮的呻吟?!是十九路军战士的精灵?!是奴隶们吼着起来斗搏的钟鸣?!”^②

因文庙改造而提供了平民生活的公共场域,形成了上海文化的今昔之变,“从前到南市去游玩,只有一所城隍庙。那里香烟缭绕,市声喧闹,爱清静些的人,真有些吃不消。现在有了文庙公园,清洁高尚,胜过城隍庙好多倍,毋怪游人趋之若鹜了。不错!那里有花草树木,亭石池沼,风景点缀得很美丽;而且有图书报纸可阅,还陈列各种模型古器,足以广眼界,增智识;城里头几位爱听书的朋友,到了里边,也有好书听,还有便宜茶喝”。民国之前的景象则完全不同,“文庙一带,不要说晚上,便是白昼也少行人经过。那时文庙的大门,还是旧式建筑,黑漆而绘有神像的大门,高有几尺的门槛,除了春秋二祭以外,总是常年的关着。门前一带照墙,面前一带菜圃。西角的魁星阁,高高的伫立。正中的大成殿,四壁生苔。一泓池水,也常年的呈着绿色。当时进去的人,只觉得庄严中带着几分凄凉……谁料一番改革,辟作公园以后,大成殿仍是大成殿,魁星阁仍是魁星阁,池沼依旧,树木无恙,而风景却大不相同”。使得作者不由得感叹道“文化愈演而愈进,我对于文庙的现在和过去,却有同样的感慨了!”^③

文庙公园也被编入到街头戏剧人的弹词里,成为了与城隍庙、豫园一样代表上海的景致。“唱罢一段重开场,文庙公园名久扬。白衣人也可游泮水,科举早废已无妨。进门先见魁星阁,大门口三架石牌坊。小假山,小池塘,小凉亭,小桥梁,小小景致小地方。钟鼓高架多威显,大成殿阁居中央。先师神位高高供,名贤排列在两旁。图书馆内陈书报,音乐室里品笙簧。各种展览室,许多新花样,健康卫生大改良。演讲厅,说书场,赵稼秋,朱耀祥,啼笑因缘凤姑娘。”^④这既描绘了文庙改造后的园林风景,又传递出民众教育馆的社会改良与家国理念,“浓荫绿树夏正长,教育馆中去徜徉。景色清幽多雅洁,平铺碧草野花香。……国术场,战迹室,一·二八往事太凄凉。荒凉闸北成址墟,第一深仇要自强。迢迢折径花架去,娱乐室丝竹韵铿锵。魁星阁气象真雄壮,大成殿宏敞在中央。钟鼓与彝器,古色古香古衣裳。再看那,摄影名家展览处,琳琅艺术好平章。阅报室时事皆分晓,秋坪一局费思量。演讲厅弹唱兴亡事,谈今说古论帝皇”。^⑤ 文庙公园的风景与民众教育馆的文化,就这样打破了圣域的界限,融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五 余论

1932年6月1日文庙民教馆园景部分率先开放以来,民教馆秉持“造成健全公民”之民众教育目的,积极筹划开展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大致可归入两大类,一是培养党国大

① 《关于文庙公园》,《申报》1932年10月2日,第18版。

② 长庚《文庙公园之夜》,《妇女共鸣》第5卷第9期,1936年。

③ 茸余《文庙公园》,《申报》1936年2月24日,第16版。

④ 《弹词》,《申报》1935年10月31日,第19版。

⑤ 《弹词》,《申报》1936年8月12日,第20版。

义、激发民族精神,一是进行社会教育、改进日常生活,而文庙固有作为儒家文化的表征,则只剩下一个在大成殿上孤零零的“祀孔彝器陈列所”,成为历史的陈迹,失去了自身的精神与鲜活的传承。文庙改造之议,起于国民革命的成功,从民间社会到国民政府都洋溢着一种革新气象,从建造文庙公园到推行社会教育、培养时代公民,执政者积极追赶现代社会,践行党义理念,展现出新政治的雄心与志气。然而文庙改造施行之时,国难已日趋深重,在民教馆筹备之期,更因一·二八沪战而中辍,以推行民众教育为己任的上海文庙民教馆,正是诞生于国家危亡的十字街头。因此民教馆成立伊始,利用文庙场域进行的社会事业就展现出了强烈的民族国家情怀,从直观鲜活的一·二八战迹展览到警醒激愤的学术演讲,都意在培育家国意识、激发民族精神。与此相比,执政党党义的灌输并不明显,而是将党义理念融入到民族国家意识与现代公民社会的教育中,这或许与大革命日渐远离有关,但更直接地应在于国难深重的刺激。虽然激荡家国情怀成为了文庙民教馆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但它并没有远离民众教育的初衷,其主要的精力与最多的活动仍然集中在通过各种方式来促进社会教育与提高日常生活上,^①并以此来推进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这也应是国民党训政理念的题中之意。改造后的文庙,虽然失去了儒家文化的外在仪征,但儒家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内在精神却在现代公民社会的名义下得到了有效伸展,日趋融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中。

自清末以来,文庙的开放一直是一个不断被提及的话题,这其中既有宣扬儒教的考量,亦是受平民主义的影响,早在袁氏当国之时便有通过文庙来推进社会教育的设想。“伟人、万世功业和高尚品德往往是化解危机时不可缺少的因素,但往往被淹没于普通百姓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为了使民间在常态下也长期纪念英雄,英雄必须成为普通百姓实际生活中的组成部分,为他们提供普遍的价值观,并帮助他们实现日常生活中的愿望。”^②由此来看,文庙走出传统圣域、致力于平民化的改制开放是适应共和时代的必由之路。北伐的成功,为推进文庙改制注入了强有力的政权力量,新生的南京国民政府部分延续了广东革命政府的理念,以革命的精神统合社会,建立自身的政治合法性,起初无意寻求儒学价值,更因“尊王忠君”一点而停止文庙祀典。南京国民政府以其权力来为新目标和新思想服务,试图把这种思想和目标加之于社会,以教义的管理人、文明的促进者和利益的保护者自居。上海文庙在这种权力核心之中,终在1930年代初将儒学边缘化,转身为民众教育馆与公共园林,在为民众提供休憩之所的同时,大力推进社会教育,宣扬家国理念。虽然诞生在一·二八抗战烽火之下的上海文庙民教馆,坚定地将培养民族国家意志赋予到公民品格之中,同时又以其鲜活多姿的活动与清幽雅致的环境,赢得了民众认同,为高高在上、冷峻肃穆的文庙融入到民间生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思路。

作者简介:张国鹏(1985—),男,山东菏泽人,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政治史。

^① 民众教育馆此一时期的具体活动内容可参见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编《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概况》,第31—201页。

^②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及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1页。